

就业与家庭照顾间的平衡： 基于性别与职业位置的比较^{*}

佟 新 周旅军

内容提要 本文使用第三期妇女地位调查资料,对城镇家庭女性的工作和家庭平衡问题进行研究。女性的双重压力依然存在,家务劳动依然占据女性更多的时间;但在职业方面女性的时间付出几乎与男性相同。女性高层次人才兼顾事业和家庭,是工作和家务时间付出最多的人。当代城镇夫妻共在职场,男性更可能因工作忙而顾不上家庭。对0-3岁孩子的抚育上,家庭支持网络应对单位制的解体,夫妻双系的父母帮助成为最主要的力量;部分高层次人才依靠市场力量,雇佣家政工来帮助抚育,但受到经济条件的制约在一般从业者中这一比例并不高。

关键词 女性 职业 家务 时间分流

问题的提出

工作和家庭的平衡是一个世界性问题。在我国,有关工作和家庭的平衡,需要从三个方面加以研究。(1) 转型视角。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形成了一整套以单位制为主的支持人们工作和家庭的制度,城镇中的双职工家庭是普遍的生活方式。但市场化给国人的工作和家庭带来了重要变化。(2) 性别视角。“男性挣钱养家、女性照顾家庭”曾是传统社会家庭的生存模式,当女性也开始进入到“挣钱养家”的行列中,呈现出两性不同的行

为策略。我们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考察:一是在工作中,两性如何承担起有关加班、出差、异地工作等压力,处理晋升需求和回应工作安排。二是在家庭照料方面,两性的家庭承诺与时间安排。三是担当起因无法有效分配时间和情感而产生的压力、焦虑和无力感,要为处理自身的不良情绪做出积极的情感努力。(3) 公共政策视角。倡导组织机构和国家出台“家庭友好型工作场所和家庭友好型公共政策”(family-friendly workplace and family-friendly policy),平衡工作和家庭的任务应当个人、家庭、组织和国家来共同承担。

* 本文系2010年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女性高层次人才成长规律及发展对策研究”(项目编号:10JZD0045-1)、2010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时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研究”(项目编号:10@ZH020)的阶段性成果。

回顾已有研究,国外社会学界对此已经形成了重要成果^①,在文中亦将进行比较分析。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两性的平等发展和共同承担责任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一项以89个国家的数据为基础的研究表明“当妇女地位与权力较高时,一国总的生活质量也较高;当她们的地位与权力较低时,所有人的生活质量也较低。”^②

我国学界也对相关问题的研究积累了一些成果。首先,在概念层面,有学者指出,要分清“抚养”和“就业”的不同。“抚养”与经济收入分不开,城镇大部分家庭的固定经济收入是通过就业获得,但就业同时具有多重目的,如追求事业、实现自我价值、扩大社会圈子等。只有承担了“抚养”的家庭经济责任才算是扮演了“抚养”角色^③。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男女都承担抚养的角色,分工主要是空间的,是屋里屋外的差异,而不是类别的即抚养与持家的差异^④。第二,要从理解国家与家庭和个人的关系入手理解计划经济时代的工作和家庭。计划经济体制建构了“国家人”概念,这个国家人是“去性别”的,无论男女都是国家的人,都在工作。这是两性共有的、首要的社会角色。但男人以社会为主,女人是以家庭为主,因此女性具有“国家人”和家庭中“性别人”的双重身份。这一建构较好地保证了国家和家庭利益的一致性,总的社会效益比较高。城镇已婚妇女的付薪劳动和家务劳动都比较繁重,但她们的角色冲突和角色紧张并不明显。这主要是因为计划体制下实施了男女平等的原则,同时在政策层面对城镇妇女的职业角色进行塑造,包括:安置性就业,保障城镇女性毕业后就有工作;男女同工同酬;协调两种生产,推进家务劳动社会化,如托儿所的建设;与工作相关联的保险福利和对职工生活的全方位统管^⑤。第三,性别视角的研究。“资源理论”认为,夫妻就业对妻子经济资源的影响是两方面的。“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既制约了妻子的经济资源,也使其不必像丈夫一样为了在工作、事业上拼搏。丈夫的资源主要来源于经济地位,妻子的资源更多地是从家务中提取。没有恪守传统观念的丈夫和妻子会受到配偶或社会的惩罚。事业型的女性会被认为“不顾家”、“没有女人味”。而事业上不如愿的丈夫也会被指是“没能耐”、“没出息”^⑥。第四,社会主义的男女

平等的文化和宣传赋予了女性新的社会位置和社会角色,女性实践了角色转型,产生了女性去性别化的工作者形象——“铁姑娘”^⑦。第五,市场转型的研究。市场体制的发育打破单位体制,集体主义的抚养观被个人主义的抚养观取代,生育、养育成为纯私人的、需要由每个家庭自我承担的责任。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学龄前儿童的抚育模式转向以市场理性选择为主的家庭和个人责任,独生子女政策更进一步强化了母亲与孩子成长间的关系,工作母亲深感压力,母亲角色与职业角色间的冲突加剧^⑧。

本文使用调查数据来分析我国城镇现阶段人们平衡工作和家庭关系的状况、时间分配等,回应如下问题:(1)现阶段城镇从业者工作时间和家务时间是怎样分配的?(2)传统的“男性以事业为主,女性以家庭为主”的性别分工模式发生了怎样的改变。(3)高层人才处理工作和家务劳动面临工作和家庭挑战应对策略是什么。(4)分析人们在处理工作和家庭关系上具有的支持系统,并提出相关公共政策的建议。

本研究使用2010年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调查标准时点为2010年12月1日。这种调查由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和国家统计局主持开展,1990年起每十年进行一次,以全国除港澳台以外居住在家庭户内的18至64周岁的中国男女公民作为个人问卷调查的对象。问卷包括个人基本情况、受教育经历、工作和职业经历、婚姻家庭情况等。第三期调查第一次纳入高层人才附卷和专卷调查。前者是在随机抽样的入户调查中,请符合高层人才条件的调查对象在填写主问卷时也填写“高层人才附卷”,而后者是按定比抽取原则,在全国31个省市对党政人才、专业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三类人做专卷调查,三类人才以1:1:1的比例选取,每省126人,各部分为42人,其内部的性别比为1:1。

研究所做的性别和职业位置的比较研究建立在全国个人主问卷与高层人才问卷(含附卷和专卷)基础上,将样本分类为城镇从业者(指调查时劳动适龄人口中正在工作的人,不含退休人员)和高层人才。为了清楚地分析工作和家庭的关系,我们从全国随机样本中挑选出城镇人口(本户常住,城市户口)中的“在业者”(不包括退休后

继续工作)和“已婚者”,是“城镇已婚从业者”。符合条件的城镇样本数为6027人,其中男性3337名,占55.4%;女性2690名,占44.6%。对高层人才样本也进行了同样的选择,即“已婚高层人才”,其样本数为3871,其中男性2120名,占54.8%,女性1751名,占45.2%。

城镇家庭的时间分配状况与特点

目前,家务劳动的形式和时间分配与职场分离,对工资收入的依赖使得家务劳动常常处于“不可见”的状况。家庭劳动分工是家庭成员分享家庭责任的方式,与人类的生产和再生产紧密相关。对此,至少存在四种纯粹的模式:一是传统模式,即家务劳动由女性承担,男性挣工资来照顾家庭。二是现代伙伴模式,夫妻都为挣工资的人,家务劳动亦由夫妻共同承担。三是家庭内代际支持模式,年轻夫妻是挣工资的人,家中事务由夫妻一方的家长照顾,特别是由年轻夫妻的父母来照顾下一代的孩子,形成隔代照顾模式。四是市场模式,夫妻皆为挣工资的人,雇佣他人承担家务劳动,或主要需求都在市场购买,包括子女入托、快餐食品等。事实上,大部分人的家庭生活是多种模式共存的。通过分析第三期妇女地位调查资料,发现在时间和家务劳动分配上有如下特点。

第一,城镇家庭出现了一些专职从事家务劳动的人,以女性为主。

调查时,在已婚城镇民众中,有15.8%的人是未从事有收入工作的劳动人口(不包括已退休/内退人员),其中女性占74.8%。在这些15.8%的人中,有58.8%的人以料理家务为主,其中女性占94.8%。对所有因料理家务而未从事有收入劳动的人,问及“为什么没有工作的原因”,其中70.6%的人是因为家里有孩子需要照顾,27.4%的人是因为家里有老人/病人需要照顾。而在家里有孩子需要照顾的人中,有64.3%的人以前工作过;在家里有老人/病人需要照顾的人中,有62.7%的人以前工作过。对已婚女性而言,未从事有报酬劳动的主因是“因家务事而不得不开工作”。

从调查问卷中的“从开始工作/务农到现在,是否有过半年及以上不工作也没有劳动收入的情况”一题发现,男性有18.8%的人表示有这种情

况,平均最长中断工作的时间有25.73个月(2.14年);其工作中断的主要原因上,结婚生育/照顾孩子仅占2.3%,照顾老人/病人仅占2.7%。女性中断过工作的比例达30.8%,平均最长中断工作的时间有33.63个月(2.80年),在工作中断的主要原因上,结婚生育/照顾孩子占55.6%,照顾老人/病人占2.4%。在城镇从业者中,女性因生育而中断工作的比例为17%,这深刻地影响到她们的职业生涯,使其在职业流动中处于劣势地位。

第二,城镇家庭的家务劳动主要由妻子承担,夫妻合作模式也占有一定比例。

从城镇已婚从业者来看,在67.2%的家庭中,家务劳动主要承担者是妻子,伙伴式合作模式占了约四分之一,传统家务劳动的分工格局没有改变。从高层人才来看,情况有所改变,尽管仍有近60%的家庭是女性更多地从事家务劳动,但夫妻合作模式有所增加,占到了三分之一。

(1)从总量上看,女性家务劳动时间远多于男性,各职业位置、各类时间上,女性家务劳动时间远多于男性,所用时间大约是男性的1-4倍。传统的女性为主负责家务的情形没有改变,性别间的差异大于职业位置上的差异。(2)男性正参与到家务劳动中,特别是在休息日,各职业位置的男性都积极参与到家务劳动中,其家务的时间虽然还是比女性少,但增加到工作日家务劳动时间的2.3倍左右。(3)分性别和职业位置的比较发现,男性间家务劳动时间无职业位置之差;女性间存在职业位置之差。在工作日,女性高层人才家务劳动时间低于一般女性从业者;但在休息日,其家务劳动时间几乎一致,接近3小时。在对女性高层人才的访谈中发现,几乎所有的受访者都强调自己平时工作比较忙,无暇顾及家庭,但是一旦有时间,她们就会亲自下厨为家人做饭,有些人是请了“阿姨”的,但仍喜欢亲自劳作,这时的劳动带有重要的情感色彩和对女性家庭角色的强调。美国社会学家霍克希尔德深入讨论了商品化过程中性别、工作、家庭和时间的复杂关系,提出了情感劳动和情感规则的概念。她认为,社会对情感有一整套规则,这些规则是一个系统,涉及一系列人们在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之间的交换关系^①。女性高层人才虽然在职场上拥有了较高的职业位置,但在家庭内,女性自觉实践着传统情感规则的

要求。

第三 城镇劳动者工作时间较长。

调查使用“前一天中,分别花费在有收入的工作/劳动/经营活动、学习(含专业培训和借助媒体的学习等)和工作/劳动/学习往返路途的时间”来了解人们的时间分配。

(1)从工作时间看,存在职业位置间的差异。在工作日,男性城镇从业者的工作时间最长,要比男性高层人才多出近半小时,但女性之间差距不大;在休息日,高层人才无论男女都要比城镇从业者的工作时间长。在工作日,城镇男性从业者平均工作时间是8小时12分钟,男性高层人才为7小时44分钟;在休息日,男性高层人才有约1个半小时的工作,城镇男性从业者有不足一小时的工作时间。(2)从学习时间看,高层人才无论在工作日还是休息日都要投入一个多小时的时间(70分钟以上)学习,而城镇从业者学习时间要少得多,一般为20多分钟。性别间均无明显差异。(3)从交通时间看,无论工作日还是休息日,高层人才都要花更多的时间在路上。从工作日看,高层人才花在路上的时间在1小时以上,女性所花时间更多。这说明城镇从业者的工作多离家较近,路程皆在1小时之内。女性间差异明显,女性高层人才要多花半小时在路上。

将工作时间、学习时间和路途时间视为与工作相关的时间,三项加总其时间使用最多的排序为:女性高层人才、男性高层人才、城镇男性从业者和城镇女性从业者。女性高层人才用于与工作相关的时间最长,约合10小时9分钟,男性高层人才约为10小时7分钟,这说明高层人才在工作时间上没有性别差异。但城镇从业者的工作相关时间花费略有性别差异,男性所花时间略长,约合9小时21分钟;城镇女性从业者所花时间约合9小时。

在高层人才专卷中问及“在解决家务负担上帮助最大的人员或机构”是什么,发现两性间有明显差异。男性高层人才首先提到的是配偶,占到74.2%,其次是母亲,占8.2%,依靠社会服务机构的比例仅为1.8%。高层女性首先提到的是配偶,有43.3%,其次是母亲,占23.6%,而社会服务机构仅占7.1%，“没有”(主要是靠自己)的占到10.5%。这表明,男性高层人才主要是透过

妻子的帮助来解决家务压力的,而女性高层人才则难以有同样的比例(差三分之一)获得配偶在家务压力上的帮助。

总之,一名女性——一般从业者和女性高层人才,其工作日与工作相关的时间是9-10小时,家务时间是2-1小时,合计在11小时左右。一名男性——一般从业者和男性高层人才,其工作日与工作相关的时间是9个半小时-10个小时,家务时间是不足50分钟,合计亦在11个小时左右。从业者们的休息和娱乐时间约为13小时。肯定地讲,在现当代,我国城镇从业者都感受到时间压力;现代工作的时间概念对人们的休息和娱乐产生规制。这样的时间规制是普遍的,无性别差异。但对女性来说,压力是双重的,传统家庭角色有一定改变,但家务劳动依然要求女性有更多的时间付出;在事业上,女性的时间付出并不逊于男性。比较发现,女性高层人才为工作和家务付出的总时间最多。

工作和家庭平衡的状况

工作和家庭的平衡是指职业人士在无法兼顾劳动力和家庭事务时所遭遇到的角色紧张,为了兼顾工作和家庭,人们要付出更多的情感和劳动。我们关注:在工作和家庭存在冲突时,人们的选择是什么,是以工作为主,还是以家庭为主。传统社会中,家庭与工作的平衡是通过性别分工来实现,形成了“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格局,那么在性别和职业位置间有怎样的状况呢?

第三期妇女地位调查问卷中,我们问了如下问题“近年来,下列情况在您身上发生过吗?1.因为工作太忙,很少管家里的事;2.为了家庭而放弃个人的发展机会”(选项包括经常、有时、偶尔、从不),希望借此了解当工作和家庭相冲突时,人们作何选择。

从“因为工作太忙,很少管家里的事”的状况看,存在性别与职业位置间的差异。(1)从性别看,41.9%的城镇男性从业者因忙于工作而无暇顾及家庭,其比例高出女性7个百分点。^⑩(2)从职业位置看,55.3%的男性高层人才会为工作而无暇顾及家庭,比城镇男性从业者高出13个百分点;而女性高层人才这一比例亦达49.4%,高出城镇女性从业者约15个百分点。

从“为了家庭而放弃个人的发展机会”看,存在性别与职业位置上的差异。(1) 职业位置的差异在于城镇从业者比高层次人才有更高的比例“从不”为了家庭而放弃个人的工作发展,高8.8个百分点;在“偶尔”会“为了家庭而放弃个人的发展机会”的比例上,高层次人才比城镇从业者高8个百分点,存在职业间的程度差异。(2) 存在性别差异。在各类职业位置上,男性大约比女性多10个百分点的“从不”会“为了家庭而放弃个人的发展机会”,但也应当看到,各类职业位置上有一半以上的女性亦“从不”会“为了家庭而放弃个人的发展”。

在高层次人才专卷中问及有关“最后一次更换工作单位的原因”,发现有22.2%的女性和14.3%的男性高层次人才是因为“想更多地跟家人在一起”,女性比男性更可能为关照家庭而变动工作。

总之,现当代城镇从业者延续了社会主义中的夫妻共同参与公共劳动的情形,男性和高层次人才更有可能因工作忙而顾不上家庭。

抚育孩子的分工和支持

从个人生命周期和家庭生命周期的角度看,生育和养育阶段,即孩子0-3岁是家务劳动量巨增的阶段。计划经济体制下,城镇以单位制的方式透过具有福利性质的托儿所、幼儿园来帮助双职工家庭实现养育的社会化。随着单位制的解体,养育责任更多地成为个人的事情。而生育和养育是最可能使母亲中断工作的原因,这种工作中断直接影响到女性的职业发展。英国的研究表明,一些女性管理者即使有能力雇用家庭佣人,她们也要比其男性伴侣承担更多的责任来对养育的事情进行安排和监督。^①一项对第一个孩子出生后又重新从事工作的560名英国母亲的调查表明,超过三分之一的母亲在两年内放弃了全职工作,其原因是雇主缺乏灵活性,他们不考虑重返工作的母亲对婴儿负有额外责任的事实。^②

在我国,城镇从业者家庭平均每家有1.13个孩子,高层次人才家庭平均有1.06个孩子。

在城镇从业者中,女性因生育而中断工作的比例为17%。再从“孩子3岁前主要由谁照顾”来看,(1) 代际间的抚育支持成为最主要的形式。

城镇从业者家庭中,由夫妻一方的父母来照顾的比例达48.5%,近一半;高层次人才家庭中,由夫妻一方的父母来照顾的比例达52.6%。同时,来自父母的支持亦打破了父系家庭网络,双系父母支持变得格外重要。(2) 存在职业位置的差异。城镇从业者,主要由丈夫照顾的比例占4.47%,由妻子负责照顾的比例为38.89%,合计由夫妻一方面照顾的比例达43.4%;高层次人才家庭中,由夫妻一方面照顾的比例为22.4%,比城镇从业者家庭少了21%。(3) 高层次人才家庭更多地依靠市场力量,借助保姆/家政工和托儿所/幼儿园的比例达21.4%,比城镇从业者家庭高出14.8%。

总之,在抚育问题上,无论怎样的职业地位都主要是在家庭内来解决,代际间的支持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高层次人才在更大的程度上依赖市场的支持。

理论讨论和政策建议

在现当代,各类职位的从业者都面对有关工作和家庭平衡的挑战。数据分析表明,第一,在时间分配上,城镇从业者都感受到时间压力;现代工作的时间概念对人们的休息和娱乐产生规制。这样的时间规制是普遍的,无性别差异。女性的双重压力依然存在,家务劳动依然是女性有更多的时间付出;但事业上,女性的时间付出几乎与男性相同;女性高层次人才兼顾事业和家庭,是工作和家务时间付出最多的人。第二,在平衡工作和家庭的关系上,现当代城镇从业者打破了传统的“男外女内”的分工格局,两性从业者都在职场打拼;高层次人才更可能因工作忙而顾不上家庭。第三,在0-3岁孩子的抚育上,来自配偶双方的父母成为最重要的支持力量,是家庭内部的支持网络帮助有孩子的父母们继续工作,得以替代单位制解体后抚育福利的缺失。部分高层次人才在抚育上依靠市场力量,雇佣家政工来帮助抚育,但受到经济条件的制约在一般从业者中这一比例并不高。

从性别角度看,在工作和家庭责任的分担上,依然呈现“延迟”状况,即女性与男性共同参与有报酬劳动,但男性并非以同样的比例参与到家务劳动中,不过情况有所改善。无疑,两性的变化是共同发生的事情,但变化的程度不同。除女性高层次人才外,女性参加有酬劳动的时间总体上

比男性少;丈夫承担家务劳动的时间总体上比妻子少。在这个双向变化的过程中,女性进入有酬劳动的变化快于男性进入家务劳动的变化。

从职业位置看,高层次人才特别是女性人才面临更为严重的工作和家庭平衡的挑战。在调查问卷中,我们问及了“最近3年,是否有过身体有病拖着不去看医生的情况”,城镇已婚从业者中有942人回答有此情形,占15.6%。在高层次人才中有1419人有此情形,占37%。问卷进一步对有此情形的受访者询问了首要原因和次要原因。

当前,身体已经有病,但拖着不去看医生的城镇从业者中有26%、高层次人才中有66%的人是因为工作/学习忙,可见,工作压力已严重地影响到其健康状况。在生病但拖着不去看医生的女性高层次人才中,因为工作忙而如此的比例高达68.4%,占到三分之二多。这一状况令人堪忧,迫切需要建立“家庭友好型”的公共政策。

由工作组织和政府制定的、有利于“工作和家庭的平衡”的政策被称为“家庭友好型工作场所和家庭友好型公共政策”(family-friendly workplace and family-friendly policy)。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显示出低水平的工作与家庭冲突,而英国和美国则有最高的工作和家庭冲突,这种冲突是源于工作时间过长和以市场为主获得支持。^⑬瑞典的公共政策是促进全民就业、男女平等和全民社会保障。工会不仅代表高工资的产业工人的利益,还努力追求缩小工人间的收入差距,有效地平衡了工作和家庭的冲突。^⑭

目前,为了平衡工作和家庭,人们需要在助老、托幼、子女教育指导和减轻家务负担方面得到政策支持。在问及目前最需要的帮助或支持时(按重要程度排序选三项),对于第一选择,城镇从业者回答“子女教育指导”的比例(4.5%)仅达高层人才的半数,而在“减轻家务负担”上,女性高层次人才中的比例(2.2%)是城镇民众女性的7倍,在“助老服务”(2.9%)上达6倍之距,这充分反映出高层女性在工作-家庭冲突上的处置机动性不如城镇从业女性,她们迫切需要政府和组织给予支持。在第二、第三选择上也有类似的情况,反映出城镇从业女性更关注的是生计问题。

综合而言,我们倡导:(1)进一步加大宣传,

使更多的男性加入到家务劳动中来,建立起合作式的家务劳动分享模式。(2)组织应给予工作着的父母们,特别是0-3岁的父母们以婴幼儿福利支持。(3)政府要加大力度建立公立托儿所和幼儿园,将幼儿教育(3-6岁教育)纳入国家公共教育的范畴。□

- ①佟新《平衡工作和家庭的个人、家庭和国家策略》,《江苏社会科学》2012年第2期。
- ②理安·艾斯勒《国家的真正财富——创建关怀经济学》(原版2007年)高钰、汐汐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
- ③左际平《改革中城市“家庭抚养”的性别建构》,《清华社会学评论》2000年第2期。
- ④罗丽莎《另类的现代性——改革开放时代中国性别化的渴望》,黄新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
- ⑤左际平、蒋永萍《社会转型中城镇妇女的工作和家庭》,当代中国出版社2009年。
- ⑥左际平《从多元视角分析中国城市的夫妻不平等》,《妇女研究论丛》2002年第1期。
- ⑦金一虹《“铁姑娘”再思考——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社会性别与劳动》,《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1期。
- ⑧佟新、杭苏红《学龄前儿童抚育模式的转型与工作着的母亲》,《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
- ⑨Hochschild, A. R., “Emotion Work, Feeling Rules,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79, Vol. 85, No. 3: 551-575.
- ⑩卡方检验 Pearson Chi-Square = 57.371, $p = 0.000$, 说明性别间有显著差异。关系强度为 Cramer's V = 0.098。
- ⑪Wajcman, Judy, “Managing like a Man: Women and Men in Corporate Management”, *Policy*, Cambridge, 1998, 152.
- ⑫吉登斯《社会学》(第4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85页。
- ⑬Crompton, Rosemary, *Employment and the Family. The Reconfiguration of Work and Family Life in Contemporary Societi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 ⑭Wallen, Jacqueline, *Balancing Work and Family: The Role of the Workplace*, New York: Allen & Bacon 2003.

作者简介:佟新,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tongx@pku.edu.cn;周旅军,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北京,100871

(责任编辑:毕素华)